

地方综合年鉴的基因谱系

——以《上海年鉴(1852)》和《上海市年鉴(1935)》为例

刘善泳*

摘要 《上海年鉴(1852)》和《上海市年鉴(1935)》分别编纂于我国年鉴发展的两个不同时段,形质各异。前者是传承西方历书传统的“历书系”年鉴,后者是承袭中国资鉴传统的史志系年鉴;前者为单篇体结构,所编选文章相互之间没有明显的领属、包含关系,后者是层层相辖的门目体结构,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前者为编录体,形如文摘性杂志,后者为撰著体,著述性较强;前者立足商业指南,服务指向鲜明,后者秉持史志之宏旨,注重历史记录。总体看,当代地方综合年鉴的基因远于前者而近于后者。通过两者对比,有助于辨清地方综合年鉴的基因谱系,为认识上的诸多分歧提供原点参考,为新媒体时代年鉴改革提供历史镜鉴。

关键词 近代年鉴 地方综合年鉴 上海年鉴 基因谱系

我国年鉴事业的发展在近代时期经历两个重要时段。一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伴随西学东渐,西方形式的年鉴在国内出现。当时既有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年刊类书籍,如清同治三年(1864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创办的《海关中外贸易年刊》;也有编译出版的年鉴,如1909年由奉天学务公所谢荫昌编译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二是20世纪30年代初至1937年抗战开始,出现地方年鉴编纂出版热潮,余绪直至1949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共出版大约80种年鉴”,“年鉴类型大致齐备,其中尤以地方性和专科性为主,各有30种左右”,“其发刊时间,以30年代前期和中期为多,尤其是1935至1936年达到高峰,而1937年后直线下降”。^①

1843年开埠的上海,较早浸淫西风并领中体西用之潮流,两个历史时段均有年鉴“代表作”贡献。前一时段,出现由北华捷报社编辑出版的 *Shanghai Almanac for 1852, and Commercial Guide*。2019年,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译出版此书时将其译为《1852年上海年

* 刘善泳,男,江西省石城县人,石城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方志学、年鉴学、地方史。

① 肖东发等:《年鉴学概论》,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第64页。

鉴与商务指南》，并简名为《上海年鉴(1852)》。^①后一时段，出现由上海通志馆编辑出版的《上海市年鉴(1935)》^②。这两部年鉴反映了两个时段年鉴的不同特点，是研究我国早期年鉴的极好标本。本文试通过分析两者区别，为考察年鉴的源流变迁提供参考。

一、书名之辨：传承西方之历书与接脉中国之史裁

Shanghai Almanac for 1852, and Commercial Guide（《上海年鉴(1852)》）是一部英文书，由北华捷报社编辑出版。《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创刊于1850年，是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份英文周刊。北华捷报社1851年开始编纂出版“年鉴”，*Shanghai Almanac for 1852, and Commercial Guide* 就是其处女作。

Almanac 和 Commercial Guide 是反映该书特点的两个关键词。Almanac 多被译作“年鉴”，Commercial Guide 译为“商务指南”。根据周振鹤《〈上海年鉴(1954)〉解题》等文章所述，Almanac 的翻译早期只有“历书”这一义项，并无“年鉴”之义。在1822年马礼逊编纂的第一本英汉词典中，Almanac 被译作“通书”，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出现“年鉴”的译义。也就是说，在这部“年鉴”出版的1852年，Almanac 还是对应于中国的历书。该书“文献”部分所辑《中国的黄历》一文的原英文标题即为 The Chinese Almanac，是当年“历书”和 Almanac 通行对译的有力实证。因此，不管是编者的初衷还是受众的认识，当年这本书首先是一本历书性质的书。这也正是我们后来称之为西方年鉴的当年模样。“其实在西方，Almanac 本来也是一种每年行世的历书，其中载有气候预测、农民的耕作时序、潮水信息以及与日历顺序相关的表格形态的信息。”^③现在整理出来的北华捷报社所编3部今天被称作“上海年鉴”的书，都是以 Almanac 为主体的。北华捷报社1851年11月刊登的 *Shanghai Almanac for 1852, and Commercial Guide* 出版广告中，Shanghai Almanac（上海年鉴）用的是大字体，Commercial Guide（商务指南）用的是小字体，两者犹如一书的大、小标题，主、从关系一目了然。更有意思的是，1853年和1854年直接用 Miscellany（文献）取代了 Commercial Guide（商务指南）。事实上，1852年虽称“商务指南”，“文献”却占大部分篇幅，或许正是因为充斥文献的实际，后面干脆以 Miscellany 代替 Commercial Guide。恰恰是书名上“文献”和“指南”的调整变化，反映该书“Almanac +”的基本体裁特点。换句话说，*Shanghai Almanac for 1852, and Commercial Guide* 就是一部带着“历书 +”传统的完全西式书籍，姑且称之为历书系年鉴。这就是当年 Almanac 进入中国落户上海的真实形态。

《上海市年鉴(1935)》由上海通志馆于1935年1月开始编纂，当年3月下旬“原稿幸

① 北华捷报社编，熊育民译，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年鉴(1852)》，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

② 上海市通志馆编，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市年鉴(1935)》，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

③ 周振鹤：《〈上海年鉴(1854)〉解题》，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年鉴(1854)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第1~2页。

得全部告成”^①，从此“始有上海市年鉴之辑”^②。考察《上海市年鉴(1935)》及其同时期地方年鉴的编纂背景发现，它们并非对历书系年鉴的简单传承，“年鉴”这一称谓也不可简单视为 Almanac 演变而来的译名。

《上海市年鉴(1935)》出版之前，国内已有多部同类年鉴面世，其中《无锡年鉴(1930)》最早。对于《无锡年鉴(1930)》的编纂初衷，时任无锡县长孙祖基在序言中申明，“考东西各国政书，体例谨严，纲目简张，图表详密，资料丰富”，于是“于县市月刊之外，并约各机关团体，并辑《年鉴》一书”。^③也就是说，编纂者想编的是一部政书，而非有样可学的西方历书系年鉴。在这部首创的年鉴中，载录有不少知名人物的题词，从不同角度呼应着政书的定位。如宋子文所题“敷政优优”，马寅初所题“市政嚆矢”，孙科所题“纳民正轨”，都是立足于资政而言的。而资政的功能恰恰契合了国人于既往中求镜鉴的历史传统，影响至广的《资治通鉴》就是最佳例证。“与鉴于水，宁鉴于人”，时人钱基厚为《无锡年鉴(1930)》所作的这则题词，也是当时认识的一个极好反映。“鉴”在中国渊源有自，而加之以“年”，本也有历史因果可溯。清代方志大家章学诚感于“州县记载，并无专人典守，大义缺如”和“修辑志乘，率凭一时采访”之弊，建议州县“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以达“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之目标。^④上海通志馆成立之后，逐年编纂年鉴正是承章氏倡导平常积累之遗意。时人荣宗锦为《无锡年鉴(1930)》题词“与年俱进”又是一个呼应。因此有理由认为，中国的地方年鉴正是承袭中国史志的资鉴传统，并假以“与年俱进”之意而命名。必须说明，“我们现在用来翻译 Almanac 的‘年鉴’一词，在中文里其来源的单词却是 yearbook(或 year book)，而不是 Almanac”^⑤。

中国的年鉴出现于西方 Almanac 进入中国之后并受其影响。所以，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被译成“年鉴”的 Almanac“拨乱反正”成当年的“历书”。何况，西方某些年鉴类的书，如美国的 *The Almanac and Book of Face*，“其中并无历书常有的那些内容”^⑥。探究 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的《无锡年鉴》《上海市年鉴》等年鉴命名的渊源因果，意在申明，年鉴其名其实和中国史志传统之间的内在逻辑应该得到正视。

二、形制之别：单篇之编录与系统之撰著

中国年鉴尤其是地方综合年鉴走了一条迥异于西方历书系年鉴的道路，表现出与之完全不同的面相。

《上海年鉴(1852)》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资讯，第二部分为文献。

① 上海市通志馆编，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市年鉴(1935)》，第 24 页。

② 上海市通志馆编，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市年鉴(1935)》，第 5 页。

③ 无锡市史志办公室、无锡市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无锡年鉴资料选编》，广陵书社，2009 年，第 2 页。

④ 章学诚：《州县请立志科议》，章学诚著，罗炳成译注：《文史通义》，中华书局，2012 年，第 924~925 页。

⑤ 周振鹤：《〈上海年鉴(1854)〉解题》，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年鉴(1854)研究》，第 4 页。

⑥ 周振鹤：《〈上海年鉴(1854)〉解题》，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年鉴(1854)研究》，第 3 页。

资讯部分包括:上海的气象与气候、日食与月食、月历、气象测量记录摘要、上海地图、中国对外贸易关税税率、上海外国船只泊船区规则、中英江宁条约、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议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通商章程、十进制换算表、黄浦江外港区与内港区潮水表、扬子江航行须知、上海保险厅、上海行名录、五口外国居民录。

文献部分包括:论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对欧洲天文学的推介,琉球海岛传教会,徐光启记略,徐光启记略(续),关于“蛮”字的翻译,关于中国内地的通信(苏州旅行),中国的婚俗,宁波的海盗、民变和家法,略述中国人的科学——算术,南京的旅行,中国的黄历,元宵灯会,江南乡试,乌柏的用途及中国白蜡的笔记,土耳其的鸦片吸食,中国格言,新南威尔士州的悉尼,中华帝国与他国比对历史年表,中华帝国与他国比对历史年表(续),新国会名单。

上述提纲根据中译本采录,与原书的顺序略有出入。译者基于原书编纂“明显存在的问题”的判断,^①将置于原书前一部分的“中华帝国与他国比对历史年表”“徐光启记略”和“中国的黄历”调整到后面的文献部分。原书之所以出现编排上的错乱,是因为“在最后一季编辑本书,本书的发行延迟过了1月1日,这需要进行调整和保持页码的连贯”^②。说的是整部书编辑过程中增加了内容,超出了原来的编辑计划,而前期已经排定的内容又不便修订,于是出现了编排上无可奈何的将就。

其实,即使编者进行了调整,两个部分的编排还是存在不尽合理的地方,如“中华帝国与他国比对历史年表”“新国会名单”等资讯类内容似放入第一部分为宜,不过,不管如何编排,这些内容都是围绕着 Almanac 和 Commercial Guide 进行编录。这正是西方历书系年鉴的一贯传统。与这种传统相匹配的,是灵活的单篇体结构。全书由37篇文章(含月历、气象测量记录等表格)构成,这些文章彼此独立,相互之间没有明显的领属、包含等关系,都是以独立个体的方式服务全书编辑意图。“《上海年鉴》编纂的用意,是为在沪上海英美侨民和商人提供一本有关上海的‘百科全书’和实用手册。”^③不过,由于采取单篇结构,这部“实用手册”的“百科”色彩并不明显,称之为“全书”也是言过其实。

《上海市年鉴(1935)》为门目体结构,以中文和阿拉伯数字标序,通常为3—4个层级。全书第一层级设特载、大事概要、土地·人口、天时·气象、党务、行政、司法、外交、军事、财政、第一特区——公共租界、第二特区——法租界、金融、教育、交通、工业、劳工、商业、农林鱼牧、学艺、宗教、社会事业、时事日志、名人录24个部分。

观察二级、三级、四级门目设置的情况,以“财政”门为例,其门目如下:

十、财政

(一)上海市财政概述

(二)一年来上海市财政行政

1. 变更田赋征收制度

① 北华捷报社编,熊育民译,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年鉴(1852)》,第5页。

② 北华捷报社编,熊育民译,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年鉴(1852)》,第5页。

③ 周育民:《北华捷报社编的〈上海年鉴(1854)〉》,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年鉴(1854)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第3页。

2. 规定清理旧欠田赋办法
3. 移转田赋征收职权
4. 接征牙税
5. 开征暂行地价税
6. 接收市区烟酒牌照税
7. 增加房捐及车捐
8. 调查房租
9. 更改乡区房捐征收办法
10. 发行民国二十三年上海市政公债
11. 划分市县原有积谷款产

(三)上海市财政岁出岁入概况

(四)上海市公债

1. 民国二十三年上海市政公债发行经过
2. 民国二十三年上海市政公债条例
3. 民国二十三年上海市政公债还本付息表
4. 民国二十三年上海市政公债用途
5. 附录

(1)市政府与新丰洋行订立之承销合约

(2)车捐表

(五)上海财政机关

1. 财政局
2. 市金库
3. 财政局南东北西稽征处
4. 财政局船捐处
5. 财政局营业税征收处
6. 财政局田赋征收处
7. 房产估价委员会

(六)中央及各省驻沪财政机关概况

1. 财政部税务署
2. 财政部税务署上海租界卷烟查缉办事处
3. 财政部盐务稽核总所办事处
4. 固定税则委员会
5. 江海关盐督公署
6. 江海关
7. 中央造币厂
8. 整理内外债委员会

9. 币制研究委员会驻沪办事处

10. 苏浙皖区统税局上海查验所

通览四级标题,第一层级的标题大致依从大的行业门类,“财政”列“军事”之后,并列于其他23个门目。二级标题,除“上海市财政概述”“上海财政机关”“中央及各省驻沪财政机关概况”3个门目外,大致根据“财政”职能进行设置。三、四级标题则以某一方面或某一具体事项编排。最末一级标题为实目。四个层级的标题纵向层层相辖,互为领属,横向分门别类,讲求全面,具有较强的系统性。这种层层相属自成体系的门目体结构,完全不同于《上海年鉴(1852)》单刀直入式的单篇结构形式,反与变革中的方志关系密切。1930年,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提出“方志新体例及进行办法案”,主张解散方志旧体,编辑年鉴、专门调查及省史三书。其所订立年鉴门目为:地理、地质、户口、民族、党部组织、行政组织、治安、教育、宗教、农业、工业、商业及金融、交通、财政、建设、民生。同年出版的《无锡年鉴(1930)》分地理、人口、党务、政治、司法、警卫、财务、交通、建设、农业、工业、商业、教育、卫生、公用、公益、宗教17个篇章,与蒋梦麟的设计方案相一致。后来的《上海市年鉴(1935)》也是大同小异。与《上海市年鉴(1935)》同年编成的名志《川沙县志》,其卷目(分志)为:大事年表、舆地、户口、物产、商业、工程、交通、财赋、教育、卫生、慈善、祠祀、宗教、方俗、艺文、人物、职官、选举、议会、司法、警务、兵防、故实、叙录。除去基于方志长时段特点而设的祠祀、方俗、艺文、故实、叙录等门目,《上海市年鉴(1935)》的结构与之大体相类,没有本质区别。

《上海年鉴(1852)》是一部编录体的书,由资料加文摘构成,与单篇体互为表里。并且不经编者加工直接“录”的内容多于经过编者编写或加工整理的“编”的内容。全书除《上海的气象与气候》《中华帝国与他国比对历史年表》等数篇文章(表格)带有编者整理加工的痕迹,其他基本都是单篇资料或文献的直接采录,形同文摘。全书前后两个部分再加比较,则资讯部分重在编录资料,文献部分重在编录文献。

所谓的编录并非漫无章法地胡乱拼凑。一方面,编录内容围绕编者预定的选题,相当部分的稿件都是来源于特约。这从“文献”部分文章行文可见其一二。如《关于中国内地的通信(苏州旅行)》一文使用的是书信体,开头便是“致《北华捷报》编辑”^①,结尾写道:“现在,编辑先生,导游了您10天800里行程,您和您的读者有点累了,虽然我还没有叙叨这个大帝国内地的许许多多地方,容我就此打住。”^②又如《中国的婚俗》文末写道:“这篇文章超出了你要的篇幅。不过,无论长短,我要说的终于说完了。”^③另一方面,编者对部分稿件有一个核对、修改、补充的“过程控制”,并非得来全不费工夫。编者在《致读者》中说:“我们克服重重困难,以确定本地的阴历月份、日食月食等,对每项记载都尽我们力所

① 《关于中国内地的通信(苏州旅行)》,北华捷报社编,熊育民译,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年鉴(1852)》,第182页。

② 《关于中国内地的通信(苏州旅行)》,北华捷报社编,熊育民译,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年鉴(1852)》,第227页。

③ 《中国的婚俗》,北华捷报社编,熊育民译,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年鉴(1852)》,第232页。

能及,求助于权威机构和专家。本地的行名录等,也经过了本地侨民的调查和验证。”^①从中可能看出,采编类的资讯主要来源于“权威机构和专家”及“本地侨民的调查和验证”,其中有编辑“力所能及”地付出,甚至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方可成全。

和《上海年鉴(1852)》单篇之编录完全不同,《上海市年鉴(1935)》全书采用自成体系的门目体结构。与之相匹配,门目之下的实体记述体现着编者“无一语不出于己”的撰著特点。以全书开篇的“特载”为例,设“市中心区建设之进行”这一大标题,记述当年上海市的建设情况,下设3个部分分述16个方面的内容,纲目如下:

市中心区建设之进行

(一)三大建设

1. 商港建设
2. 交通建设
3. 文化建设

(二)新社会之形成

1. 住宅
2. 菜场及商店
3. 学校
4. 电话局
5. 广播无线电台
6. 树艺标本局
7. 学会
8. 救火会

(三)五项公共建筑工程概要

1. 体育场
2. 图书馆
3. 博物馆
4. 市立医院
5. 卫生试验所

“三大建设”小序记曰: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国庆日,市府新厦暨社会、土地、卫生、教育、工务各局新局落成,市中心区初期建设工程遂大致告竣。是岁之杪,市府暨各局既联翩迁治;更积极进行第二期建设,谋繁荣市中心区以达到实现大上海计划之目的。综其要点,约有三事,即商港建设、交通建设与文化建设是也。是时一方有市府之殚精擘划经营,一方有社会民众之拥护与推进,故一岁之间,建设林立,人尽其责,各获所需。盖以强有力的市政府,领导觉醒的市民,策群合力,推动理想的市政建设之巨轮,功艰事

^① 北华捷报社编,熊育民译,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年鉴(1852)》,第5页。

巨,心迹意密,民族自强精神之表现,殆未有若今斯其盛者也。^①

从这段小序可以看出,“三大建设”是编者“综其要点,约有三事”的提炼,和后面的“新社会之形成”“公共建筑工程”及其往下延伸的门目一起,支撑起“市中心区建设”的完整叙事。整个小序篇幅不大,却是述而有作,显然经过编者“烹炼”加工。其中既有“初期工程”“二期工程”的概括记述,又有“实现大上海计划之目的”的点评,还有“一岁之间,建设林立”的因果分析,最后还有一段类“太史公曰”的评述,不忘“为市政府”唱一曲“功艰事巨”而“心迹意密”“殚精擘划经营”的赞歌。从小序可以看出,编者专设“特载”,一方面是因市政建设呼应“大上海计划”,另一方面是“殆未有若今斯其盛”的市政建设诚为年度之重大事项。如果说,《上海年鉴(1852)》编者充当的是信息传递者的角色,即提供“年鉴”这个平台,由“他”跟“你”说;那么,《上海市年鉴(1935)》的编者就是故事的组织者和讲述者,利用“年鉴”媒质,由“我”跟“你”说。

三、功能之异:商业之功利与史志之宏旨

《北华捷报》是《上海年鉴(1852)》的“母体”,1850年8月由英国商人奚安门(Henry Shearman)在上海创办,其创刊号《致读者书》阐明办报宗旨:“最重要的是要竭尽全力唤起应有之热情,支持从现在水平上同整个庞大帝国(清廷)建立更加密切的政治联系,更加扩大对华贸易……还要使公众懂得,不能只顾暂时和眼前的利益,而应具有全局和长远的观点,认识到这样做对于英国和整个文明世界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并看到这个巨大的帝国拥有惊人的丰富资源。”^②

《致读者书》所称的“公众”主要是指外国在中国的外交官员、传教士和商人,《北华捷报》所服务的主要就是这个群体。旨在唤起他们“同整个庞大帝国建立更加密切的政治联系”的“应有之热情”,以达到“更加扩大对华贸易”之目的。同时,基于“这个巨大的帝国拥有惊人的丰富资源”,服务于他们在“暂时和眼前的利益”基础之上谋求更加“全局和长远”的利益。《上海年鉴(1852)》无疑是这一办报思想的延伸,书名中的“商务指南”(Commercial Guide)已经明确反映了这一思想。周育民评述《上海年鉴(1854)》载录洋行名录时说得更为直白:“这些洋行都是老牌的鸦片走私行。《上海年鉴(1854)》提供的这些趸船及船长、大副、二副等信息,在当时的洋人和中国走私贩看了便心知肚明,至于干什么非法勾当,编者是不负责任的。”^③

《上海市年鉴(1935)》由上海市通志馆编辑出版。根据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修志事例概要》的要求,上海市通志馆于1932年7月正式成立,聘任柳亚子为馆长。三年后,在编纂通志的同时开始编纂年鉴。柳亚子在年鉴创刊词中,把年鉴编纂和通志修纂相

① 上海市通志馆编,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市年鉴(1935)》,第49页。

② 马光仁:《上海新闻史》,转引自沈思睿:《报馆三人行——〈北华捷报〉初创期职员小记》,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年鉴(1854)研究》,第136页。

③ 周育民:《北华捷报社编的〈上海年鉴(1854)〉》,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年鉴(1854)研究》,第19页。

提并论,二者一以贯之,均“以科学研究地方史料之首创者……以研究上海为毕生事业”,“年鉴则创始于今兹,私冀其岁辑一篇,永永无休”。^①

一个承载商业之功利,一个寄予史志之宏愿。不同的编纂主体秉持不同的编纂理念,造就两种年鉴更多方面的不同。

第一,不一样的“上海”。两部年鉴均以上海标其地域,但“上海”在两部年鉴中的意味完全不同。对《上海年鉴(1852)》而言,“上海”有两种意味。一是此书出版并主要发行流通于上海,二是这部书主要服务于部分“上海人”,即上面提到的外国侨民和商人。书中关乎上海的内容有气象气候、地图、外国船只泊船区规则、潮水表、保险行、行名录等,其他内容均与上海没有直接关系,把它们放在《上海年鉴》可以,放在其他年鉴也未尝不可。《上海市年鉴(1935)》则完全以上海为对象,记录上海市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全书所有门目无一不指向这一特定地域。所谓“以研究上海为毕生事业”,“将使寰球人士,咸知上海之所以为上海”。^②

第二,不一样的年度。两书既然皆称年鉴,自然均标以特定年度。但是,年度的意味也不相同。《上海年鉴(1852)》的1852年首先是个历书年份,也是书名 Almanac 之所本。基于历书的时效,这本书自然要在1852年之前发行到读者手上,所以北华捷报社在头一年11月发布的广告称,此书“将于明年1月1日之前出版”。^③但是,此书的内容又并非局限于1852年,只能说以1852年的名义将相关信息缀附于此,或者这些信息为这个年度中的读者服务。1935年对《上海市年鉴(1935)》来说却不一样。它不但标示该书的出版年份,更为重要的是,该书所记述的内容完全关联于这个年度,即以其上一年度作为记事年度。如果说1852年是服务性年度符号的话,1935年就是记录性年度符号。正是因为记录,后者无法在当年(1934年)与读者见面。尽管上海通志馆提前谋划,并“全力从事于编纂,每日工作八小时延长至十小时”^④,但还是到1935年3月下旬才完成初稿。

第三,不一样的期许。作为指南的《上海年鉴(1852)》,所期许的多是当下的效应,比如更大的订阅量。于是,“今年我们已经尽心尽力,以表对公众服务的诚意,相信也会得到相应的回报”^⑤。正因如此,编者想方设法增强吸引力的实用性:“我们相信,各种信息和附加文字,会增添本书的吸引力和实用性。”^⑥虽然时过境迁之后,当年北华捷报社所编的年鉴今天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料,但这显然不是他们当时所期许的。《上海市年鉴(1935)》以年鉴而名,自然也讲求时效,但寄寓着通今古之变的“历史使命感”。柳亚子所作序言,溯及传统方志“上焉者仅得比于史料,又多半生半熟,未经烹炼;下焉者则断烂朝报而已”之弊,企望贯通方志和年鉴,“以科学方法研究地方史料”,从而达到“纵观四千年,横瞩九

① 上海市通志馆编,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市年鉴(1935)》,第5页。

② 柳亚子:《序》,上海市通志馆编,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市年鉴(1935)》,第5页。

③ 周育民:《北华捷报社编的〈上海年鉴(1854)〉》,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年鉴(1854)研究》,第1页。

④ 上海市通志馆编,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市年鉴(1935)》,第23页。

⑤ 北华捷报社编,熊育民译,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年鉴(1852)》,第5页。

⑥ 北华捷报社编,熊育民译,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年鉴(1852)》,第5页。

万里,殆未有其伦比”的宏图大旨。^①再往前几年看《无锡年鉴(1930)》,透过时人顾树森所作的“功同史乘,益比志书”、何玉书所作“梁溪史乘”等题词,类似期许昭然可见。

落实到具体内容当中,前者的服务特色和后者的记录风格更是泾渭分明。《上海年鉴(1852)》三个方面的指向非常鲜明。一是服务于通商。这在资讯部分表现突出,《中国对外贸易关税税率》《上海外国船只泊船区规则》《中英江宁条约》《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议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通商章程》《十进制换算表》《上海保险厅》《上海行名录》无一不是直指通商主题,《黄浦江外港区与内港区潮水表》和《扬子江航行须知》则为入沪的通商船只提供指南信息。因为该年鉴服务于外国侨民,所以,《五口外国居民录》其实就是为他们制作一份“朋友圈”名单。

二是向侨民贡献中西交流知识。这在文献部分表现突出,《论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对欧洲天文学的推介》《琉球海岛传教会》介绍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播;《关于中国内地的通信(苏州旅行)》《中国的婚俗》《略述中国人的科学——算术》《南京的旅行》《中国的黄历》《元宵灯会》《江南乡试》《中国格言》《乌柏的用途及中国白蜡的笔记》《徐光启记略》《宁波的海盗、民变和家法》介绍中国的情况,关乎历史、科技、文化、地方风情等,相关话题和西方多有关联,后将述及,此处不赘。《关于“蛮”字的翻译》和《中华帝国与他国比对历史年表》明显关乎中西交流与比较。《新国会名单》既是重要资讯,其实也是编者国籍立场的一个反映。

三是基督教倾向非常鲜明。基督教是西方文明输入的重要方面,也是全书的一条暗线。一方面,“文献”的部分选文直接以此为主题,如《论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对欧洲天文学的推介》《琉球海岛传教会》。还有间接关联的,如《宁波的海盗、民变和家法》和基督教在舟山的传教密不可分,其所称的“民变”也是起于传教者和民众、官府之间的冲突。《略述中国人的科学——算术》的话题则关联到“17世纪开始,天主教传教士得到宫廷的承认”,关联到“由于利玛窦、汤若望等人的工作,许多欧洲的科学传给了中国人”等通过传教士进行西学传播的背景。^②《徐光启记略》是因为在利玛窦于1601年到达北京后,“徐光启似乎是他最持久的合作者”,并且“徐很快信奉了罗马天主教,以保罗的教名洗礼入教”,^③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为耶稣会士在中国境遇改善作出重要贡献。在《关于中国内地的通信(苏州旅行)》《中国的黄历》等选文中更是时时看到基督教信徒的影子。如《关于中国内地的通信(苏州旅行)》写到“一年四季都有人来这里拜祭他们的已故祖先”时感慨,“天啊,却没有谁会向上帝鞠躬。中国人祭拜始祖和历代先人,却不知道上帝才是人们应该礼拜的”^④。写到同里有5万人口时设想,“是不是应该有10个神父去他们中间?1位神父

① 柳亚子:《序》,上海市通志馆编,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市年鉴(1935)》,第5~6页。

② 《略述中国人的科学——算术》,北华捷报社编,熊育民译,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年鉴(1852)》,第271页。

③ 《徐光启记略》,北华捷报社编,熊育民译,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年鉴(1852)》,第147页。

④ 《关于中国内地的通信(苏州旅行)》,北华捷报社编,熊育民译,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年鉴(1852)》,第193页。

对 5000 居民,是有大量工作要做的”^①。《中华帝国与他国比对历史年表》更是以耶稣诞生的公元纪元作为参照,并将大量的《圣经》历史编年其中。

《上海市年鉴(1935)》记录风格也可谓形神兼备。先从标题上看,24 个一级标题中,前后各有一个记录性标题,前为“大事概要”,后为“时事日志”。在二级、三级、四级标题中,更是使用诸多记录性字眼,如“沿革”:上海疆域沿革、上海市行政机关沿革;“进行”:市中心区建设之进行、(新生活运动)工作方案之进行;“经过”:上海市民众团体组织经过、民国二十三年上海市市政公债发行经过;“纪要”:二十四年星象纪要;“变迁”:市组织法之变迁;“大事记”:一年来两路大事记、一年来航空建设大事记;“大事概要”:(上海市教育)一年来大事概要;“史略”:上海党务史略、(上海教育)发展史略;“史迹”:佛教在上海之史迹;“略史”:造林运动略史;“汇志”:上海金融消息汇志;“杂事”:一年来上海出版界之杂事;等等。

这些记录性标题自然联结着记录性内容。选取一个较为简短的实例,如“军事”之“(淞沪警备司令部)成立经过”: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三月,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攻克上海,任杨虎为上海警备司令,但未几即撤销。同年九月,白崇禧奉命组织淞沪卫戍司令部于旧淞沪护军使署原址,自兼司令之职。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春,白氏率军西征,中央派三十七师师长熊式辉代理卫戍司令。同年四月,改淞沪卫戍司令部为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一职,由三十二军军长钱大钧兼任。九月,钱氏他调,仍由第五师师长熊式辉兼任司令。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一月,熊氏调任赣省主席,继任者为前十九路军师长戴戟。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月,戴氏辞职,由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兼代司令。按淞沪警备司令,在戴任以前,均系军人,至以行政官兼司令者,则自吴市长始。^②

此段文字记述的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设置及长官变化过程,虽然简略,但也要素齐全,脉络清晰,甚至有“以行政官兼司令者,则自吴市长始”的精要评述。相对于机构、人事的记述,事件的记录要更为繁复,限于篇幅,不再例举。

四、基于比较的地方综合年鉴基因谱系之辨

根据可见文献,北华捷报社在《上海年鉴(1852)》之后,又接续出版两个年度的年鉴。其中,《上海年鉴(1853)》为残本,缺失“文献”部分,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已将其影印件及译本附之于《上海年鉴(1852)》一并出版;《上海年鉴(1854)》则在更早得到影印整理,并出版《〈上海年鉴(1854)〉研究》文集。稍加比对便可看出,两部年鉴完全沿袭创始的路数,由历书(资讯)和文献两大部分组成。历书部分继续刊录气象气候、日食月食、月历、潮汐表、洋行录(保险厅)等资讯,同时选录《望厦条约》《中法五口通商章程》等重要的商务

^① 《关于中国内地的通信(苏州旅行)》,北华捷报社编,熊育民译,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年鉴(1852)》,第 193 页。

^② 上海市通志馆编,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市年鉴(1935)》,第 389 页。

文献。文献部分《上海年鉴(1854)》选文主题与《上海年鉴(1852)》基本一致,较为集中于科技、文化(民俗)、历史、旅行等方面,继续扮演中西信息桥梁的角色。概言之,19世纪50年代这3部《上海年鉴》都是立足于服务外国在华侨民,采用单篇体结构,以编录文献资料为主要方法,均为传承西方历书传统的“历书系”年鉴。

和《上海年鉴(1852)》一样,《上海市年鉴(1935)》之后,上海通志馆连续编纂1936年、1937年度的《上海市年鉴》,之后中断。1946—1948年,上海通志馆年鉴委员会和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又续编了3部同名年鉴。民国时期编辑出版的《上海市年鉴》共计6部。后面5部年鉴中,前2部是接踵而续,体例、文风一以贯之;后3部虽然时隔10年后再行编纂,但不管是谋篇布局还是行文章法,也是一脉相承,相沿无易。概括说,6部民国年鉴都是采取系统性较强的门目体结构,注重历史记录,带有明显的撰著色彩,都是承袭中国资鉴传统的史志系年鉴。

基于之前两部年鉴的对比分析并延伸至两个时段的其他年鉴,可以肯定地认为:以《上海年鉴(1852)》为代表的3部清代年鉴,和以《上海市年鉴(1935)》为代表的6部民国年鉴,是两个不同时期编纂的两种不同年鉴。这种不同,不是某一种年鉴在发展过程中的基因突变,而是不同编纂主体基于不同历史传统和时代要求所做出的两种不同选择。

那么,当代的地方综合年鉴和上述两种年鉴是什么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上海年鉴》无疑是最合适的对比样本。上海市于1996年起编纂《上海年鉴》,现将《上海年鉴(1996)》正文目次抄录如下:

特载、大事记、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在沪活动、上海概貌、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海市政府、政协上海市委员会、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浦东开发开放、其他开发区、经济联合与协作、工业支柱产业、市部属工业、县区乡镇工业、三资企业·民(私)营企业、农业、建筑业·房地产业、交通·邮电、银行·其他金融机构、保险、商贸·市场、对外经济贸易·外资、综合经济管理、城市管理、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史志·档案、医疗卫生、体育、人民团体·群众团体、军事、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监察·行业纠风·信访、外事·侨务·台港澳事务、民族·宗教、区县、著名人物·先进集体

显而易见,这种结构和《上海市年鉴(1935)》并无二致——除因为客观上行业分工更细、党政部门设置更为繁复等客观原因而导致门目数量增加较大之外,甚至包括“特载”“大事概要”“名人录”等非部门性栏目也得到基本沿袭,只是有些名称稍有变化。“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在沪活动”则没有脱出前者“时事日志”的范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可以从前者带有专记色彩的“特载”中找到呼应。浏览全书可以发现,其分目、条目的设置完全相类于前者自成体系的门目体结构,实体记述则完全相通于前者突出的记录(记述)特点。至于以特定年度为记述时限、以特定地域(上海)为记述对象的特点,更无须赘比。新中国时期上海市创编年鉴时,再一次选择了接脉我国悠久历史传统的史志系年鉴,而不是带有西方历书传统的历书系年鉴。

由于全国各地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大都以修志经验为基础,以先出年鉴为参考,以互学互鉴为进步阶梯,后期又以《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等相关文件为规范,以质量评比为导

向,因此,全国三级综合年鉴特别是同级年鉴的面目大同小异,并且年年相续,保持着结构、体例、文风等方面的基本稳定。正因为如此,《上海年鉴(1996)》的选择,与其说是上海的选择,不如说是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的一次“集体选择”,其承载的基因谱系既传承于今日,也可以推及于全国,为地方综合年鉴之共性。

辨别近代上海两种不同年鉴的形质之异,辨明它们与当代《上海年鉴》的亲疏关系,对于认识地方综合年鉴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重要启发价值。

一是有助于溯寻地方综合年鉴的渊源。在论及我国年鉴的渊源时,几乎所有的年鉴学专著和相关论文都将我国的年鉴历史关联于西方年鉴,将悠久的西方年鉴传统作为我国年鉴发展史的一部分,并多称年鉴为“舶来品”。又把地方综合年鉴作为近现代之后一个重点加以论述。于是,我国较晚出现的地方综合年鉴和其他类别的年鉴一起,源头连接在具有悠久历史的西方年鉴之上。只是由于两者确实区别太大,不好衔接,相关论述显得含糊不清,语焉不详。或者干脆将两者分开论述,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避而不论,出现所谓的“两张皮”现象。目前尚未见到有论者从内生发展的逻辑完整论述地方综合年鉴形成的“中国道路”。近代两种年鉴的对比已经表明,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基于自身的历史传统,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年鉴的基因谱系。这个问题,既是地方综合年鉴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年鉴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理应引起年鉴理论界的相当关注及深入研究。

二是有助于破解对地方综合年鉴的认识困惑。正是由于缺乏对地方年鉴基因谱系的准确辨识,长期以来甚至地方综合年鉴出现以来,就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和无谓的歧见。比如,地方综合年鉴到底是工具性质还是史裁性质的“资料性文献”?存史与服务到底是什么关系?该如何兼顾?甚而包括索引编制、卷次标注等形式上的认识分歧问题。既然地方综合年鉴的基因承继于中国史志传统,而非嫁接于西方年鉴传统,那么就应当运用原点思维来破解这些困惑。如工具与史裁之间,当以史裁为本,工具兼之;存史与服务之间,应以存史为本,服务兼之;关于索引的编制,撇开电子时代检索手段的进步,于著述体史志书本身而言,似无编制的历史逻辑;关于卷次的标注,从其记录性特点看,似应标注记述年度更为合理,但标注出版年份既成惯例,又无关本质,因之也无妨。

三是为地方综合年鉴创新发展提供历史经验。以《上海年鉴(1852)》和《上海市年鉴(1935)》的比较作为参照,年鉴界对地方综合年鉴乃至年鉴学的发展、创新还可以有更为深入的思考。比如,为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从《无锡年鉴(1930)》开始包括《上海市年鉴(1935)》在内的地方(综合)年鉴,没有直接传承西方历书系年鉴,而选择创设一种新的“年鉴”体裁?或许,我们可以用“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水土说”进行简单回答,但传统和现实的情势趋向显然不可以一言以蔽之简单了事。如今,地方综合年鉴面临着改革的迫切需要,甚或需要进行重新选择,细细考察20世纪30年代的那一次选择,无疑是相当有益的。

责任编辑:范锐超